

中國新聞事業簡史

陸定一題簽



方漢奇 陳業劭 張之華 編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國新聞事業簡史

方汉奇 陈业劭 张之华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方汉奇 陈业劭 张之华 编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本社内部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8.75

1983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3次印刷

字数：212,000 册数：43,501—78,500

统一书号：7011·94 定价：1.10元

编写说明

这本《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原有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两部校内讲义合并而成的。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和向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有关新闻史的基本知识,特加以修订,公开出版。

本《简史》共分七章。前两章由方汉奇执笔。初稿完成于1964年,1972年、1982年先后作过两次修改,曾以《中国近代报刊简史》为名,作为讲义在校内印刷发行。校外也有过翻印本。这次公开出版,对原章节作了调整,并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了一些订正和补充。后五章由陈业劭、张之华执笔。陈负责其中的第三、第六章,张负责其中的第四、第五、第七章。这一部分是在早先印发的校内讲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初稿完成于1964年,由黄河主持,陈业劭、张之华参加。1966年、1979年由张之华、陈业劭先后作过两次修改。这次公开出版,又由陈业劭、张之华作了再一次修订,纠正了一些夺失,补充了新闻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增加了一部份有关新闻史人物的传记材料。

1954至1959年,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为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参加,曾经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作为内部教材在校内印发。本《简史》的后五章在编写过程中,曾经从中得到不少参考和教益,值得记述和感谢。

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可能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业	1
第一节 中国报刊的起源	1
第二节 十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6
第三节 近代劳动人民的革命宣传活动	16
第二章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20
第一节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	20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办 报活动	38
第三节 民国初期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报刊	63
第三章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业	70
第一节 民主主义报刊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	71
第二节 我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	88
第三节 新闻工作的重大改革	96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新闻事业	10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	105
第二节 国共合作后的革命报刊	116
第三节 北伐战争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革命 报刊	132
第四节 我国无产阶级办报传统的初步形成	142
第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47
第一节 长征胜利以前的革命根据地报刊	148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报刊	160
第三节	反文化“围剿”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新闻事业	167
第四节	一二九运动前后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	180
第五节	抗日战争前夜的革命根据地报刊	186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89
第一节	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191
第二节	整风运动中解放区新闻工作的改革	203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发展	219
第四节	沦陷区抗日报刊反对敌伪统治的斗争	232
第七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38
第一节	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	239
第二节	解放区新闻事业关于解放战争和城市政策的宣传	249
第三节	土地改革宣传中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255
第四节	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斗争。新闻事业大变革的完成	261

第一章 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中国报刊的起源

一、邸报、小报和京报

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是封建宫廷发布的政府机关报。因为由地方政府派驻首都的“邸吏”负责传发，所以称为“邸报”。在有些古代文献中，邸报也被称为“邸钞”、“阁钞”、“朝报”、“杂报”、“条报”、“除目”、“状”、“状报”、“报状”或“京报”。

唐朝的邸报由各地派驻首都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邸务留后使改称进奏官，在上都知进奏院的统一管辖下，进行邸报的发布工作。唐朝邸报已经使用纸张，是否印刷，尚无确证。唐末人孙可之在《经纬集》中所写的有关《开元杂报》的文章，是关于邸报的较早的较详细的记载。最近在伦敦发现的敦煌邸报，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最古老的报纸。它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距今约一千一百一十年。

宋朝的邸报也由进奏官负责传发，当时全国各地派驻首都的进奏官总数为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人，受上都进奏院领导，每五日、十日或一月发行一次，发报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审核，称为“判报”。

元明两朝撤销了都进奏院，改以通政院（元）或通政司（明）

为发布官报的机关。清朝初年的官报则由内阁发布，准都察院、内务府各衙门的承抄官及各省派驻北京负责传递官报的提塘官前往誊录下报，亦称邸报。

邸报的内容主要是：1.皇帝的诏书、命令和皇帝的起居言行；2.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3.皇室的动态；4.关于封建政府官员的升黜、任免、赏罚、褒奖、贬斥等方面的消息；5.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给皇帝的工作报告，各地驻军将领的战报，封建言官对朝廷措施的规谏，对失职官吏的弹劾等）和皇帝的批语。没有一般新闻和言论。

为了作好邸报的发布工作，各个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都有关于邸报发布办法的具体规定，并派遣亲信的官员主管发报机关，监督发报工作。

邸报的内容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完全适应这个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实行阶级专政的需要。邸报稿件的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严格的检查。各个封建王朝都定有邸报稿件的预检制度。宋朝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起开始实行的“定本”制度，就是一种预检制度。各朝当局对邸报稿件的取舍，都经过慎重的考虑，不利于它的统治、不符合当权派利益的稿件一律不得见报。

重要稿件的取舍，往往由皇帝本人亲自决定。

邸报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它的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级政府官吏为主，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豪绅巨贾往往也可以设法看到它的抄件，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

汉唐以来的各封建王朝都严禁邸报以外的任何报纸出版。宋朝的小报就是曾经遭到查禁的一种非法报纸。

小报最早出现于北宋末年，盛行于南宋。发行小报的是一部分驻在首都负责传送邸报的各地进奏官，中央政府机关中的个别中下级官员，和一部分坊间书肆的主人。他们在省寺监司等中央

政府机关和宫廷内安置了一些人，专门为他们探听消息，提供材料，然后委托坊间的书肆镂板印行。当时人称这种小报为“新闻”。

小报的内容以邸报还没有发表或不准备发表的“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为主，旨在为关心政局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些参考消息。它所刊载的材料或为邸报所无，或发表在邸报之前，很能吸引一些人的注意。

小报所刊载的消息，不完全可靠。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派系斗争的时候它往往也被利用来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小报刊印过当时的主战派官员反对投降妥协和呼吁抵御外侮的奏章，透露过北方人民英勇抗敌，和前线爱国官兵枕戈待旦迫切求战的情况，对当时的抗金活动起过有利的影响。

宋朝的封建统治者严禁小报的出版，他们给小报加上了“撰造浮言”、“乱有传播”、“肆毁时政”、“动摇众情”等罪名，宣布它是非法的报纸。并且用各种方法对出版小报的人进行惩罚。但是小报一直到宋朝末年也没有被禁绝。

元明清等朝也出现过类似小报的出版物，当时称为“小本”、“小钞”或“报条”，同样遭到了当时政府的查禁。

十六世纪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者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翻印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被混称为“邸报”。大部分的报房京报是用雕板印刷的，也有手工誊写的，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才普遍使用活字印刷。开设报房，出版和派送京报，从明朝中叶起已经成为一项公开的行业。报房京报可以公开叫卖和接受订户。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官吏、豪绅和巨商。和官方的邸报一样，²报房京报以刊载朝廷准许发布的官方文件为主。它实际上是邸报的翻

版。明朝的统治者对官方文件的发布控制得非常严格，所有有关水旱灾害、农民起义和清兵入侵等不利于他们的统治的文件和消息都不准见报。

清朝入关后，报房京报获准继续出版。到了清朝末年，仅北京一地的报房就有聚兴、聚陞、聚恒等十家之多。它们所发行的京报用土纸和胶泥活字印刷（光绪末年有些报房改为木活字或铅活字印刷），日出七八页至十数页一小册，总发行数达一万余分。因为多用黄纸作封面，所以被称为黄皮京报。这些报纸并不代表什么舆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传声筒。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允许它出版，其目的和编发邸报一样，都是为了利用这一舆论工具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

二、揭帖、旗报和牌报

古代中国有过大小几百次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和统治的农民起义。在发动群众和对敌斗争的过程中，起义的农民队伍都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他们还没有条件出版报纸，但是已经知道运用和报纸相近似的工具和方式进行革命宣传。

最初的农民起义者只知道用口头宣传。有时还利用符录、瑞应、谶纬、阴阳五行等带有迷信外衣和神秘色彩的方式进行宣传。

唐以后的农民起义者逐渐知道运用更多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宣传。他们经常在街市和公共场所散发预制的宣传品，当时称为“匿名帖子”。元末的农民开始用带有鼓动性词句的旗子进行宣传。当时浙东的农民就曾经把这些旗子遍插各地，鼓动群众起来进行反元斗争。

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开始广泛地利用揭帖来进行宣传。这些揭

帖有誊写的也有印刷的，类似传单，对敌人有很大的精神逼迫作用。

以上的宣传方式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李、张所部每到一地都立即用揭帖宣传他们的政策，并在揭帖上公布当地豪绅地主姓名，号召苦主对他们提出控诉。农民起义队伍派往敌后进行工作的人员，也经常利用揭帖进行动摇和瓦解敌人的宣传。

在旗帜上书写简单鼓动口号进行宣传的方法，在李、张所部的起义军中发展成为旗报和牌报。

旗报以布旗为之。牌报以质轻和便于携带的方形木牌为之。上面除一般的鼓动口号外，还写有起义军的政策、法令和最近的战报。例如：

“知会乡人民，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断不淫污抢掠”。

这是一六四四年二月十六日李自成部从昌平发往北京及其附近各县的牌报。

“今报：……皇上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

这是一六四四年八月八日李自成部从大同发往河北北部各地的牌报。

旗报和牌报从起义部队中发出后，即由专人持往敌后，供各地人民传阅。当时还在明朝政府统治下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江苏等省，都曾发现过农民军的旗报、牌报。旗报和牌报突破了封建政府对农民起义新闻的封锁，报道了起义军的辉煌战果，宣传了起义军的“免赋”、“均田”等政策和严明的军

纪，促使农民踊跃地加入革命队伍，积极支持和响应起义军的革命斗争。这些宣传品在当时是曾经起过近似报纸的作用的。

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在进入北京后，曾经设有类似明朝政府通政司之类的机关——知政司——专门负责政府文报的发布工作，如果不是由于局势的逆转（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待了一个多月就撤退了），他们是会创办出自己的报纸的。

①中国早期报刊的历史证明报纸是阶级的舆论工具，是一个阶级和敌对的阶级在宣传上进行斗争的锐利的武器。

封建统治阶级因为掌握着政权，又拥有便利的物质条件，所以能够最先利用报纸这种工具来进行镇压和欺骗愚弄劳动人民的宣传，他们所创办的邸报在巩固他们的政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和宣扬他们的思想观点、毒害麻醉和禁锢人们的头脑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封建社会时期的劳动人民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没有出版自己的报纸，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运用近似报纸的宣传工具来和敌人作斗争。他们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御，勇于和封建暴君作斗争的革命精神。他们的一些宣传方式和方法，对后来的劳动人民的革命宣传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十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一、最早的一批中文近代化报刊

近代化报刊在我国的出现是和外国人的入侵同时开始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最先在我国用外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都是外国人首先创办的。

从一八一五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二

百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几乎垄断了我国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

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是他们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和他们在中国传教、设立学校、医院和吸引留学生一样，都是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第592—593页）。

①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结束，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量办报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外文报刊。

②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中文的近代化报刊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月刊，①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创刊于

②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用木板雕印，每期五页，约两千余字，由精通中文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担任主编。该刊初印五百册，后增至两千册，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中的一部分还由专人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籍一道分送给参加乡试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该刊于一八二一年停刊，先后出版了八十多期。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以后，外国人又陆续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近代化的中外文报刊，重要的有：

《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1826），中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依经杂说》（1828— ），中文，澳门；

《天下新闻》（1828—1929），中文，马六甲；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中文，广州、新加坡；

《各国消息》（1838— ），中文，广州；

《澳门钞报》（1834—1838），葡文，澳门；

《广州纪录报》（1827—1845），英文，广州、澳门、香

港；

《中国丛报》(1832—1853)，英文，广州、澳门。

在外国人创办的这些中外文报刊中，中文报刊是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它们的主编人大部分都是精通中文的外籍传教士。在外国人还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中国人民对他们还深怀戒心的情况下，这些报刊还不敢放肆地宣传他们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大部分都暂时以宗教刊物的姿态出现。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宣称其办报宗旨“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它所刊载的文章如《耶稣主义之大要》、《全知与遍在》、《异教徒反对基督教之回答》等，都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他报刊的情况也大抵类此。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1. 用宗教这种精神上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民，向他们灌输耶稣基督的忍耐、保守和受苦受难的教义，劝说他们俯首贴耳地接受侵略者的凌辱，不要抵抗，以便于他们宰割和统治。2. 用宗教来掩护侵略者的罪行，使中国人民把他们当成虔诚的宗教徒和宣扬“上帝恩纶”的使者，对他们的阴谋活动失去戒心。

为了进一步消除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憎恶和顾虑，这些中文报刊还极力鼓吹中外友好，并且一再为侵略者表白，说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只是为了“阐扬宗教”和“促进人类之道德”，对中国毫无恶意，中国人民应该“视万国当一家”，“视外国人与中国人当兄弟也”以共结“外中之绸缪”云云。

总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还没有准备成熟，外国人的势力还不能深入中国腹地的时候，这些中文报刊还不能不暂时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来欺骗中国的读者，它们的言论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过分地刺激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感情。这一点和后一时期的外报的宣传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和中文报刊的情况相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传教士、

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就毫不掩饰他们作为侵略者的喉舌的狰狞面目。它们公开地攻击中国政府的禁烟政策，抵赖本国商人的贩毒罪行，嘲笑中国国防力量的薄弱，侮辱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软弱的民族”，鼓吹立即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沦中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一部分外文报刊还负有刺探情报的任务。它们系统地刊载介绍中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的文章，刊载有关中国军队调防情况及沿海要塞火力配备情况的调查资料，还译载了中国官方关于禁烟问题的大量函牍文电，供本国政府参考，充分地发挥了坐探的作用。

这一阶段在中国办报的马礼逊、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主编）、裨治文、巴驾（《中国丛报》主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是外国侵略者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一批从事文化侵略活动的人。

二、教会和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

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结束到这一世纪的末叶，是资本主义在华办报活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和华北。在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创办了近一百七十种中外文报刊，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大部分刊物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主办的。鸦片战争以后，教禁解除，外籍传教士大量涌进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一八八七年前后，在华外籍传教士增加到一千七百余入，在华外国教会的全年总经费达到一百余万两。不少刊物就是利用以上的经费在宗教的掩护下用外国教会或外国传教士的名义出版的。其中以英美教会和英美籍传教

士出版的居多。一八五三年在香港创刊的《遐迩贯珍》，一八五七年在上海创刊的《六合丛谈》，一八七二年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一八七八年在上海创刊的《益闻录》等，就多出于英美传教士之手。它们的主编人麦都思、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玛高温等，就是随着侵略者的军旗第一批闯进中国内地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进行文化侵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它们的言论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诬谤。

一八八七年规模宏大的教会出版机关广学会在上海成立，这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宗教的掩护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大本营。它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纶”为幌子，先后出版了两千多种书籍和十多种期刊，开展广泛的欺骗和愚弄中国人民的宣传，帮助帝国主义进行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思想的工作。

①广学会主编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①一八六八年创刊，先为周刊，后改为月刊。在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②《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个教会报纸，但是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性的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

和其他教会报刊一样，^③《万国公报》极力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辩护，称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吹嘘教会慈善机关对中国人民的“造福”，威胁中国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

和其他教会报刊一样，《万国公报》也介绍过一些“西学”，并且一再吹嘘它在“传播文明”即介绍“西学”方面对中国人民做过如何如何有益的贡献。所谓“西学”在当时主要指的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介绍来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知。《万国公报》利用当时正在摸索救国道路的一些中

国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的心理，刊载了一些介绍“西学”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十分肤浅，它们并没有把真正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民，它们之所以侈谈“西学”，目的只在于借此吸引一部分中国读者，和炫耀西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在读者中散布崇外、媚外、惧外的奴化思想。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万国公报》也热心地展开了如何在中国实行“变法”和推行“新政”的讨论，先后刊载了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条议》、《新命论》，林乐知的《中西关系论略》、《文学兴国序》，甘霖的《中国变新策》，李提摩太的《醒华博议》、《新政策》等策划在中国实行所谓变法新政的文章。)其中《新政策》一文还曾作为条陈送给光绪参考。《万国公报》所宣传的变法新政和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人物所宣传的变法新政，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个报纸一再强调必须“逼令中国开其本有之利源”，必须引用大量“西人”管理中国的政教诸事，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归根结底是为了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这和希望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的维新派人物的变法主张，是根本不同的。

②《万国公报》的主要编辑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 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0) 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派驻中国的文化特务。他们通中文，长期居留中国，除传教和办报外，他们还经常以学者、教育家、慈善家、和清朝政府客卿的姿态周旋于官绅之间，从事刺探情报和干预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

《万国公报》是在一九〇七年主编人林乐知死后停刊的，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了四十年 (其间一度休刊七年)，刊期之长，在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中居第一位。它的发行网遍及清朝政府的各级政府机关和府县以上的教育机关，发行数字